



# 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

——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

○李 红 著

学术文库

◎ 文物出版社

# 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

## ——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

李 红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 / 李红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 - 7 - 5010 - 4798 - 7

I. ①隋… II. ①李… III. ①家族—研究—中国  
IV. ①K820.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1020 号

**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

——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

著 者：李 红

责任编辑：张晓曦

封面设计：程星涛

责任印制：张道奇

出版发行：文物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 编：100007

网 址：<http://www.wenwu.com>

邮 箱：[web@wenwu.com](mailto:web@wenwu.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16

版 次：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10 - 4798 - 7

定 价：70.00 元

---

# 序

这是一本研究世家大族的专著。对世家大族的关注和研究，受到学者的重视。近代以来许多学者都先后发表了关于世家大族的文章，最受人们关注的是陈寅恪的论述。

对家族及家族史的研究在一个时期成为中古学术史的热点。世家大族受到重视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它是当时社会关系中的主角，世家大族对中古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极其重大的影响。对世家大族的具体研究（包括个案），可以加深对世家大族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探讨，利用历史学、社会学、统计学等方法分析中国中古时期世家大族资料进而说明中古社会演变、成为中古史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

《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一书为博士论文修改而成，河东柳氏作为“关中郡姓”韦、裴、柳、薛、杨、杜之一，有其独特的发展历程，本书利用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对河东柳氏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本书利用了隋唐史籍及墓志资料，较系统地梳理了河东柳氏的世系，着重探讨了隋唐时期柳氏的仕宦、婚姻、归葬等问题，一定程度地揭示了隋唐时期柳氏的整体情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柳氏驸马支系的问题，以瞿林东为组长的答辩委员会对此评论道：“文章还涉及柳氏驸马支系问题，并做了考证，可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缺漏。”本书对柳氏在隋唐两朝的境遇做了分析，指出唐朝柳氏发展的不显，在分析的基础上有作者自己的心得体会。

隋唐时期士族已经趋于衰微，本书以柳氏家族文化的不断适应性为士族衰落时期的自我修复与调整给出了新的见解：河东柳氏作为望族大姓，在其衰落之时，于文学、史学、谱学、书学各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家族文化所形成的社会影响力因其优秀的作品及思想与精神的广泛流传而具有一定延续性，使得家族的社会地位也相应延续，从而实现了其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的分流。

李红同志 2002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在撰写毕业论文期间，认真阅读史料，在充分分析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各方观点，给出自己的见解。全书论点清晰。本书对于河东柳氏的世系考证以及家族文化的探讨，丰富了人们对中古大族的认识。

该书付梓之际，乐为之序，聊表祝贺之意云。

施建中

二〇一六年六月

# 前　言

## 一、选题意义

家庭<sup>①</sup>，是指共同居住在一起的、在经济上有共同利益的、有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可以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联系也是社会有机体内部的最基本的联系，这种联系最早无疑发生在具有血亲和姻亲关系的家庭间。而家族<sup>②</sup>是由婚姻和亲子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亲属关系，包括血缘和姻缘关系。某些家庭组织往往由于共同的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形成在较长时间内结构相对稳定的利益集团，构成了规模大小不一的家族。这些家族在较长时间内的延续和发展中凝结和积淀出具有鲜明个性的精神文化特质。他们往往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或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有的家族史甚至构成一国或一个民族历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孔子家族。在中国历史上，周初分封制所确立的宗法制度最早确立了中国家庭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样式，虽然后来秦始皇确立了郡县制度，但由于西汉之后，儒学占据了中国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以周礼为摹本的孔子学说在国家系统的组织下不断强化。纲常礼教、忠孝观念深入人心。个体价值实现修、齐、治、平，无不遵循个人、家庭（族）、国家、天下的路径，因而与西方相比，家族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和影响。

在此意义上，一个家族的发展与衰亡是社会发展状况的一个剖面，通过家族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社会文明的进步。在中国历史上，特别在中古

<sup>①</sup> 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关于家庭、家族概念的解释。

<sup>②</sup> 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及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时期<sup>①</sup>，某些大家族形成的社会群体对当时社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他们在当时都具有强烈的地方权威性和社会认同性，这些家族可以称为世族或者著姓、士族、世家大族或门阀士族等<sup>②</sup>。

东汉时期，士人主要通过察举、征辟出仕。大官僚与自己的门生、故吏结成集团，以增加自己的政治力量，这些政治集团，即为门阀士族，他们在社会上具有特殊地位，在本州、郡的势力具有垄断性，甚至当政的外戚、宦官都要同他们联结、周旋。汉末的世家大族，魏晋时称为士族，对当时的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名士多出于这个阶层，或者在政治上与之相关。曹操时曾发布“唯才是举”令，选用那些不齿于名教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曹丕称帝之前，曾采纳陈群建议的九品官人之法，即九品中正制，士人品定之权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里，按人才优劣评定品第高低，多少改变了名士操纵选举的局面。西晋时虽仍袭用九品中正制，但中正一般只注意被评定者家世的封爵与官位，不能真正起到选择人才的作用，以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西晋规定高官显爵者各按官品高下占有田地，并有法令规定免除租税、徭役，士族得以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东汉、曹魏以后世代高官且世袭封爵的家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拥有特殊地位，形成门阀士族。

西晋亡后，东晋王朝就是在门阀士族的拥戴下建立起来的。南朝世家大族虽然在社会上经济上的优越地位未变，但实际军政实权大为削弱。南朝士庶之别非常严格，士族通过仕宦途径和婚姻关系来维护门阀制度，形成封闭性集团。士族所居官位都是被认为“清显”的职位，一般不理政事。士族中又有高低阶层之分，两者之间一般也不通婚。低级士族担任的某些官职，高级士族不屑担任。侯景之乱使世家大族遭受了沉重打击。陈朝时，无论侨姓士族或江南士族，

<sup>①</sup>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序中有，“本书所谓‘中古’，是指东汉献帝建安至唐昭宗天佑年间（197—906年）……所以取这七个世纪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二：一、汉魏之际是一个变革期，许多人物在这段时期升降，唐末五代又是一个变革期，既存的门第在这时期消融；二、如果将这七百年分为二十七个代，则士族自汉魏上升以来，在统治阶层皆占百分之五十以上，至后唐时才降至百分之五十以下，士族不仅在社会中居主导地位，在政治方面亦占各期高级官吏之绝对优势，在这个意义之下这七个世纪属于同一个社会架构，朝代之更替似乎是换汤不换药，因此社会史的分期并不等于朝代之更替，以同一个社会架构作为研究社会史的大段落，则有其基本上的共同性”。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sup>②</sup> 宋德熹：《中古门第观念探微》中对于其称谓及界定做了研究，载于《兴大历史学报》1995年第5期。

不仅政治上早已无所作为，社会声望和经济地位也都一落千丈，但是门阀势力仍占有重要地位，成为中央政府的掣肘。自南北朝后各朝各代都通过各种形式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这些士族门阀，如建立国学馆、编写氏族志、科举制等等。

隋末唐初，士族及士族制度虽然已经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但这时的地方世家大族仍然十分活跃，一些中原的高门大族尤其是关陇大族仍然牢牢控制着中央政权。中唐以后，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逐渐瓦解，到了唐末五代，从东汉末年以来就一直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彻底瓦解，形成了以祠堂、家谱和族田为主要特征的新型的家族制度。

以家族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演变的一个视角，将可能在某些方面弥补以国家、社会、地域、专门史等方面研究视域的缺陷。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早就提出“地域—家族”的研究方法，认为士族是研究中古社会的关键，“种族及其文化”是治唐史的一把钥匙。史学界对隋唐的家族个案，包括山东郡姓、关中郡姓、吴地侨姓等地域的名门望族皆有研究，对博陵崔氏、清河崔氏<sup>①</sup>、赵郡李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琅邪王氏、范阳卢氏<sup>②</sup>、渤海高氏、河东裴氏、彭城刘氏、京兆韦氏、河南郑氏、弘农杨氏等的研究均有相当成果，这些研究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以个案形式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隋唐社会士族政治及家族发展等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世家大族的发展和壮大是中古时期一个显著的时代特征，河东柳氏正是这一时期众多显赫家族的一员。

河东柳氏是隋唐时的河东望族大姓，无论在河东地区还是对隋唐中央政权都有重要影响<sup>③</sup>。隋代河东柳氏名人有柳裘、柳俭、柳机、柳庄、柳彧、

<sup>①</sup> 夏炎：《隋唐世家大族政治社会地位变迁研究——以清河崔氏为中心》，《唐代史研究》第7号，唐代史研究会（日），2004年。

<sup>②</sup> 爱宕元：《唐代范陽盧氏研究——婚姻關係を中心に》，载川勝義雄、礪波護编：《中國貴族制社會の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学研究所，昭和六十二年（1987年）三月三十一日发行，第151页。

<sup>③</sup> 河东地区自东晋时起治蒲坂（今山西永济蒲州镇），辖境为今山西西南汾河下游至王屋山以西一角，隋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改为河东郡。虽然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地区，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为军事上控制关中的门户，在隋末唐初刘武周末平时，唐高祖李渊曾想退守关西，秦王李世民就上表云：“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高祖武德二年十月癸卯》）尽管此处“河东”所指范围多有歧义，较河东郡有所扩大，但此区域确实对中原政治中枢有着关键的影响。

柳述等，唐代河东柳氏有宰相三人：柳奭、柳浑、柳璨。其中柳奭、柳璨籍贯为今山西，柳浑籍贯为襄州<sup>①</sup>，但其祖先是从河东地区迁去的。著名的文学家柳宗元、谱学家柳冲、史学家柳芳、书法家柳公权也都属于河东柳氏，河东柳氏家族在隋唐政治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

河东大族柳氏与隋唐中央政权早有渊源，其与关陇士族<sup>②</sup>集团的关系非常密切，早在北周时期，据《周书》卷三二《柳敏传》记载，河东柳敏就“加帅都督，领本乡兵，俄进大都督”，《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中也阐明了府兵将领领乡兵的重要性及其与关陇士族集团的密不可分。唐朝著名史学家柳芳在《姓系论》对魏晋以来的士族所作论述中有：“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sup>③</sup>的说法，李衡《唐绛州闻喜令杨君故夫人裴氏墓志铭并序》中，也称裴氏“与韦柳薛，关中四姓焉”，把韦、裴、柳、薛称为关中四姓，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有解释：“其所云‘关中’实际上是包括河东之裴、柳、薛及弘农之杨在内的，亦即西魏境内诸著姓”。<sup>④</sup>关于河东柳氏亦属关中郡姓的原因，毛汉光认为“河东地区之裴氏、薛氏、柳氏三个大士族及当地豪强，在北朝东西政权敌对之时，一直是关中政权的强烈支持者”<sup>⑤</sup>，故柳芳将裴氏、柳氏、薛氏亦归入关中郡姓，关陇集团人物在与东部政权交战之时，实已渐渐把河东人物纳入在内了。

从柳芳对关中郡姓韦、裴、柳、薛、杨、杜的排列次序来看，亦包含着与关陇集团的亲疏远近。“河东大士族裴氏、柳氏、薛氏等其主支大部分归向西魏北周，其人物与关中政权长期结合，所以时人将此三大士族归类于关中郡姓之中。”<sup>⑥</sup>李浩在《“关中郡姓”辨析》中也说：“河东地近京畿，与弘农皆为两汉司隶校尉所辖七郡之一，西魏、北周以来又是关陇集团的直接

<sup>①</sup> 治今湖北省襄樊市。

<sup>②</sup> “所谓关陇士族，是指关中、陇西和河东地区的以京兆韦氏（晋建威将军韦楷之后）、河东裴氏（魏尚书令裴潜之后）、河东柳氏（晋廷尉卿柳轨之后）、河东薛氏（晋尚书右仆射薛兴之后）、弘农杨氏（汉太尉杨震之后）、京兆杜氏（魏尚书仆射杜畿之后）及陇西李氏（西凉王李暠之后）为代表的一个松散的世家大族集团。”（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

<sup>③</sup> 《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传中·柳冲传》。

<sup>④</sup>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sup>⑤</sup> 毛汉光：《北朝东西政权之河东争夺战》，《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35期，1987年。

<sup>⑥</sup> 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

控制区，从文化地理上与关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政治上，河东裴、柳、薛三氏从北魏开始，历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杨隋、李唐等北方政权，簪缨冠冕，代不乏人。其不仅加盟关陇集团，而且成为此集团的核心人物，遂使东西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倾斜。……河东大族裴氏、柳氏、薛氏等其主支大部分归向西魏北周，其人物与关中政权长期结合，所以时人将此三大士族归类于关中郡姓之中。”<sup>①</sup>

由于河东大族势力与关陇集团的这种微妙关系，河东地区的隋唐士族柳氏的个案研究对于探索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对于发现整个隋唐士族中的地方望族与统治集团的关系等情况的研究是有帮助的。

中古时期士族发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其世系、仕宦和婚姻状况等因素，对于这些因素的研究可以直接把握一个士族的整体实力及其与当时的皇室和其他士族的关系，这对于更好理解一个家族的整体情况有很大的意义。因此，本文拟从河东柳氏源流入手，通过对其家族的世系、婚宦、籍贯迁移和家族文化四个方面的研究，探索这个家族在隋唐以前及隋唐时期的发展历程，希望对隋唐河东柳氏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清晰的认识，从而加深对整个士族阶层的了解。

在隋唐社会条件下，类似河东柳氏这样的地方望族的发展情况如何，并且是如何与隋朝及唐朝社会转变相互作用的，这些家族的兴衰与政治变迁有何关系，诸如此类种种问题都要通过对各个地域范围内的家族个案进行研究来找到答案。本文就选取隋唐河东柳氏家族作为个案，试图通过对其兴起、发展与衰亡，家族的籍贯迁移、学术传承情况等的研究，探讨士族发展、崛

<sup>①</sup> 裴、柳、薛之所以被称为“关中郡姓”的原因应从其历史、地理渊源和文化渊源等方面来进行思考。从河东柳氏西眷归周回迁等情况来看，柳氏由于其郡望的地理位置偏近北周政权，其对北周政权的支持显然强于被北齐政权的支持，因此得到北周政权的强烈认可，称之为“关中郡姓”。另一方面，根据苏秉琦先生对于六大考古学文化区系的划分的观点：全国范围内现今人口分布密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其中就把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单独划分为一个区系，这虽然是一种“暂设”的认识，却是对近年来在这一地区的考古发现进行总结后得出的，因此这一划分不无道理。根据这种划分，关中（陕西）与晋南地区成为一个整体，并以“关中”命名，晋南地区的郡姓裴、柳、薛三姓也被笼统划入其中，称为“关中郡姓”。河东地区及其三大郡姓裴、柳、薛与晋隋政局与关陇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汉光先生对此即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在著作《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一书中专辟章节对河东地区及河东大族裴、柳、薛在晋隋之际对当时的政治、军事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了深刻论述。

起、兴盛、衰亡的过程，并发现家族兴衰规律的特性。观察河东地区乃至整个隋唐社会的发展状况。通过对其家族文化发展演变的研究，透视地区文化乃至整个隋唐文化发展的特点。

## 二、主要内容

在分析研究河东柳氏的郡望河东地区的地理历史沿革的基础上，本文从河东柳氏的源流谈起，首先通过对其世系的考证与分析，补正了《新唐书》卷七三上《宰相世系表》中柳氏支系部分的缺漏之处。在此基础上，勾勒出了河东柳氏定居河东后的发展脉络。

南北朝以前的河东柳氏发展较为缓慢，北魏以前人物仕宦皆不显，直至“西眷”柳恭裔孙柳僧习时，才在正史中对其事迹多有所载，西晋灭亡后，北方陷于五胡十六国战乱，河东柳氏家族中一部分族人留守河东，另一部分则南徙于汝、颖和襄阳。南徙襄阳的河东柳氏“东眷”后裔柳元景及其子孙辈柳世隆、柳庆远等迅速崛起，在南朝宋、齐、梁朝时期由武入文，成为北方豪族在南方成功发展的典范。

西魏北周时期，当权的宇文氏深知地方豪强势力对其政权的影响，对柳氏家族格外厚待。隋朝统一全国以后，河东柳氏各个支系纷纷归于北方，与隋唐统治者积极合作，在“关陇集团”中争得一席之地，为其家族在隋唐时期的继续发展开辟了道路。

经过了隋末农民战争及唐初抑制士族力量发展的种种政策，如修《氏族志》、完善科举制度等措施之后，河东柳氏在唐朝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武则天被立为皇后，许多李唐王朝的元老重臣遭受贬杀，河东柳氏西眷后裔柳奭支系也遭受重创，河东柳氏家族发展陷于低潮。

对于唐代河东柳氏发展的整体情况，本文根据正史与墓志中发现的河东柳氏人物的情况作了统计，并从仕宦、婚姻关系、归葬与籍贯迁移三方面做了分析，结果表明河东柳氏在唐代的发展整体趋于平缓，仕宦情况表明与前朝相比，柳氏族人的仕宦品级有所降低，人物谱系较为模糊；婚姻关系中，与李唐皇室直到中晚唐依然有通婚的事例，与传统世家大族通婚的比例较高；归葬情况中，传统的归葬观念已经淡薄，客死他乡者就地安葬。族人的郡望与族属意识减弱，士族制度已经很松散。

使得河东柳氏声名在外的除了唐初宰相柳奭等二十多人并居尚书省的显赫之外，最著名的就是其家族文化底蕴的深厚。文学家和思想家柳宗元、书

法家柳公权、史学家柳芳是其家学的优秀代表；中晚唐时的宰相柳浑直言进谏的精神，以及兵部尚书柳公绰“一门三杰”形成的严谨家风；加之晚唐柳玭集柳氏家法大成的家训名篇《柳氏家训》，构成河东柳氏家族文化的独特风貌。

河东柳氏家族文化为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河东柳氏家族整体实力随着唐末士族的衰落而衰落，但其家族能继续维持声望不坠的原因却是因其独特的家族文化而获得的声誉，底蕴深厚的文化因素是世家大族社会地位形成的重要基础，河东柳氏的家族文化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三、学术史回顾

关于隋唐士族家族的研究，毛汉光的《中国中古社会史论》<sup>①</sup> 和《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两部论著及《唐代统治集团的社会变动》等论文，利用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处理士族的资料，有很多独到之处，对士族问题提出了深刻见解。王伊同所著《五朝门第》<sup>②</sup> 较早地系统研究了晋、宋、齐、梁、陈士族高门的历史变迁及其文化风貌。台湾学者的研究还有何启民《中古门第之本质》<sup>③</sup>，宋德喜《中国中古门第社会史研究在台湾——以研究课题取向为例（1949—1995）》<sup>④</sup>。

国外学者如日本守屋美都雄的论文《唐初名族太原王氏世系考》，通过史传、墓志等材料对太原王氏家族的世系房支、门第兴衰及家族精神生活、家族主要人物的活动做了研究，爰宕元的论文《唐代范阳卢氏研究》对野史、小说中见到的卢氏及范阳卢氏的世系、籍贯、迁徙、葬地和婚姻关系等基本问题的探讨也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sup>⑤</sup> 在探索中国中世的研究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共同体”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学者姜士彬（David G. Johnson）所著《中世纪中国的寡头政治》（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lorado, 1977）及长篇论文《一个大姓的末年：晚唐宋初的赵郡李氏》（The Last Years of A Great Clan: The Li Family of ChaoChun in Late Tang and Early

<sup>①</sup>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版。

<sup>②</sup> 王伊同：《五朝门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 年版。

<sup>③</sup> 何启民：《中古门第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78 年版。

<sup>④</sup> 《兴大历史学报》第六期。

<sup>⑤</sup> 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华书局，2002 年版。

Sung) 与伊佩霞 (Patricia Buckley Ebrey) 著《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是欧美史学界关于中古世家大族研究的代表作品<sup>①</sup>。

个案研究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之一，大陆史学界关于世家大族的个案研究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兴起的<sup>②</sup>，比较著名的有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sup>③</sup>，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sup>④</sup>，陈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sup>⑤</sup>，杨际平、郭锋、张和平《五一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sup>⑥</sup>，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sup>⑦</sup>，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sup>⑧</sup>，王永平《六朝江东世家大族之家风家学研究》<sup>⑨</sup> 等。

关于世家大族的各项研究中，从研究的时间来看，中古世家大族的研究遍及整个中古时代，研究热点分别集中在东晋南北朝及唐代；研究专题来看，涉及经济、政治、婚姻、文化等各个领域；从世家大族的地域上来看，主要包括江东士族、吴姓士族、侨姓士族、青齐士族、齐梁士族等集团的研究；从姓氏来看，主要包括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鄢陵庾氏、河东裴氏、颍川荀氏、京兆杜氏、余姚虞氏、江东顾氏等家族的研究，对于河东柳氏的研究也有学者涉及。

对于士族的研究，郭锋的《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

<sup>①</sup> 张广达：《近年西方学者对中国中世纪世家大族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 年第 12 期。

<sup>②</sup> 安群：《十年来国内门阀士族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 年第 2 期；容建新：《80 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大族个案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 年第 4 期；陈爽：《近年来有关家族问题的社会史研究》，《光明日报》1998 年 10 月 16 日。

<sup>③</sup>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sup>④</sup> 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 年版。

<sup>⑤</sup> 陈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 年版。

<sup>⑥</sup> 杨际平、郭锋、张和平：《五一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岳麓书社，1997 年版。

<sup>⑦</sup> 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

<sup>⑧</sup> 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 年版。

<sup>⑨</sup> 王永平：《六朝江东世家大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 年版。

阳、敦煌张氏为中心》一文，对不同地域的张姓郡望进行了研究，并且把张姓旧族与新门做了对比，从中找出了隋唐之际的士族变动的一些情况，以清河张氏成为同姓共望为例，总结出郡望向姓望转化与士族政治社会运动的终结之间的关系。夏炎的《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以时间为序对清河崔氏的源流、清河崔氏大族的形成以及十六国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清河崔氏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全文材料翔实，但对于士族衰落时期的问题并未提出新的观点。另外还有张卫东的硕士论文《唐代荥阳郑氏个案研究》，爱宕元的《唐代范陽盧氏研究——婚姻關係を中心に》<sup>①</sup>，周征松的《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河东裴氏的杰出人物做了考证研究，其所占有的材料极为丰富，文章内容充实，但其未能对于唐代士族在衰落时的情况做深入探讨。

对于河东柳氏家族的研究成果较少，研究著作有当代学者韩树峰的《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第五章《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特发展历程》，其内容主要是论及魏晋南北朝河东柳氏家族在南朝的兴盛历程，在柳氏发展初期，柳元景由战功起家，其侄柳世隆父子由武入文进行了转化，元景、世隆两代蝉联三公之位对其家族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地方势力与中央势力互为依援是其家族兴盛的可靠保证。韩树峰认为柳氏家族由武入文的转化以适应南朝玄学之风和柳氏家族地方势力与中央势力的互相支持等因素是一起促成河东柳氏在南朝社会发展成为高门甲胄的重要原因。李文才先生的《襄陽柳氏与南朝政治——南渡士族个案研究之一》<sup>②</sup>一文中通过河东柳氏中的人物柳元景、柳世隆、柳庆远对南朝政治的巨大影响，把河东柳氏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分析了以襄陽为中心区的荆襄晚渡士族中的北方旧族在南朝的发展情况。

另外，陈琳国的《论南朝襄陽的晚渡士族》<sup>③</sup> 和张灿辉的《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sup>④</sup>也从不同角度对河东柳氏家族的情况做了论述，以上对于河东柳氏的研究成果都只限于隋唐以前，隋唐时期河东柳氏的发展与衰败情况的研究论文笔者尚未见到，究其原因，南朝河东柳氏由武入文，一度地位极

<sup>①</sup> 川勝義雄、礪波護：《中國貴族制社會の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学研究所，昭和六十二年（1987年）三月三十一日发行，第151页。

<sup>②</sup> 《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年第14卷第4期。

<sup>③</sup>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sup>④</sup> 《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

其显赫，其发展道路具有独特之处，而隋唐时期河东柳氏虽然声望不减，但已经远远逊色于南朝时期的鼎盛，对当局的政治影响已经不能与南朝时期相比了，隋唐时期其家族的发展轨迹正反映了士族的衰落轨迹，而且柳氏家族在文化发展方面依然有其独到之处。有鉴于此，本文希望对隋唐河东柳氏的情况做试探性的研究。

台湾学者毛汉光在《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中的部分章节也有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河东柳氏的发展与兴盛情况的，他对于柳氏在永嘉之乱后的分支情况等进行了研究分析。

梁静的论文《中古河东柳氏家族文化述略》，对于河东柳氏作为诗礼传家的名门望族，在儒学、家教、家法、才艺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及其所形成的家族文化传统进行了论述，她的另一论文《中古河东柳氏与文学概述》则对河东柳氏家族及柳宗元的文学成就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古河东三姓文学研究》不仅较为详细地介绍柳氏家族起源及其在南朝由武转文的发展历程，还概括了柳氏军功起家、门风豪勇、谨守礼法，孝悌传家等家风家学，并对柳氏家族以柳宗元、柳浑为代表的文学群体进行了考察与研究。

邓军的硕士论文《唐代柳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对于柳氏家族在唐初的兴盛、武则天临时受到的沉重打击、在牛李党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较详细阐释，对柳氏家族的婚姻状况，包括与皇室及与其他士族之间的通婚、柳氏家族对唐代文学的贡献进行了研究。

王其祎、周晓薇的论文《新见隋仁寿元年〈柳机墓志〉考释——兼为梳理西眷柳氏主支世系及其初入关中跻身“郡姓”之情形》，根据新发现的隋代《柳机墓志》展开个案考证，将柳氏西眷主支世系进行了梳理与补正，并根据墓葬情况，对柳氏西眷在西魏、北周、隋唐间发展及其演为“关中郡姓”的情形给予了论述。

任颖卮博士学位论文《唐代蒲州研究》中对于蒲州士族柳氏与李唐建国时期的几位柳氏人物有所论及。

姚卫霞、吴超的论文《近二十年来河东柳氏家族研究综述》则对于近二十年来，学界关于河东柳氏家族的研究如家族起源、变迁、家族文化等进行了综述，并指出了一些尚需深入研究和重视的方面，如家族女眷的研究、唐末以后的变迁等。

张玲硕士论文《河东柳氏东眷及柳浑研究》考订了河东柳氏东眷柳浑的

家族世系，考察了柳氏东眷在江左发展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考校了柳恽的生平与创作，并对其诗歌的艺术风格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姜晶硕士论文《南朝时期河东柳氏发展轨迹研究》对于河东柳氏的族源及柳氏东眷在南朝的发展进行了论述。

隋唐时期河东柳氏家族中主要人物的研究集中在柳宗元一人身上，对于柳宗元的研究硕果累累，无论是从他的家世到仕宦，还是从政治生涯到文学成就、思想影响都有论文发表，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本文中将从柳宗元的《晋问》入手，对于他与河东的关系方面进行探讨，力图有所创新。

隋唐时期河东柳氏家族中其他人物的研究论著不多，其中对于书法家柳公权的研究论文有：赵力光的《唐柳公权撰〈柳愔愔墓志〉考》，作者通过柳公权给其小女柳愔愔撰写的墓志结合其他史料，考证出了柳公权的家庭葬地及其儿女的情况，崔延和的《唐代书法与颜筋柳骨》和陈龙海的《柳公权书碑系年考》分别对柳公权的书法艺术进行了研究与整理。罗小红博士论文《唐代家礼研究》中专列一章对柳氏家族中柳公绰谱系、家族简史及《柳氏家训》的纂修时间、目的、内容进行了探讨，总结出了柳公绰家族重儒学、礼法等家礼特征。陆晓波论文《河东柳公绰家礼及〈柳氏家训〉研究》研究了柳氏家礼的价值、《柳氏家训》编撰的背景、目的、内容及柳氏家礼的特征。此外，对于史学家柳芳的研究有郝润华的《关于柳芳的〈唐历〉》，对于柳芳本人及其所著的史书《唐历》进行了研究。本人拙作《山西历史上的著名史学家柳芳》则对于柳芳的入仕、史学成就与谱学成就进行了简要论述。

另外，对于柳氏家族中的柳裘、柳俭、柳机、柳庄、柳彧、柳冕、柳奭、柳冲等主要人物在一些学术作品中都有论及。但笔者尚未见到有详细的专门论述。

研究方法上，本文将以“河东柳氏”为研究对象，从河东柳氏源流入手，以时间为线索，对河东柳氏世系进行考证，以其世系分支的传承，后裔籍贯的迁移等基本情况作为铺垫，重点考察河东柳氏在隋唐时期的发展与衰败情况，在对其隋唐时期的情况进行研究时，主要从仕宦、婚姻、归葬情况几方面进行统计分析，以墓志资料补充正史中的不足，以家族发展的关键人物为闪光点，点缀其中，力图把河东柳氏的整体情况较为清晰地反映出来。

在对河东柳氏由盛而衰的过程及原因进行分析时，希望本文能找出其作为隋唐士族个案所具有的特性及与整个隋唐士族的共性之间的关系，然后从其家族在文化发展方面的贡献进行深层探究，不仅看到柳氏家族在文化上的

成就，还能看到它在整个隋唐时代发展中所处的地位。

个案研究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之一，将个案研究运用于史学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可行的史学研究方法，史学界在 20 世纪下半期就已兴起了对于中古时期世家大族的个案研究。

本文的研究方式除传统的考证外，还利用了统计学的方法，对于柳氏家族的仕宦、婚姻情况等进行研究，对人物进行量化处理，对结果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对比，希望能从数字中对河东柳氏发展趋势和规律有所发现。在对河东柳氏家族进行研究论述时，还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对其在前朝与隋唐时期的情况进行比较。文献方面除了正史资料外，积极利用墓志及地方志资料，唯物辩证地分析资料，通过现象探求原因和本质，尽可能找出事物的发展规律。